

关 注

截至11月24日,电影《长津湖》含预售票房已超56.94亿,超越2017年上映的《战狼2》摘得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同时成为全球影史战争题材票房冠军、全球华语电影票房冠军,并继续位居2021年全球电影票房榜榜首。从9月30日电影上映至今,《长津湖》一骑绝尘,连续打破三十余项影史纪录。该片耗资高达十三亿元,拍摄团队超过七千人,群众演员逾七万人次,创下中国电影史上投资、制作、演职人员规模新高,堪称当下新主流电影的标杆之作。《长津湖》将宏大气魄与个人情怀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契合了当下大多数中国观众的心理预期。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新主流电影的创新讲述方式进行及时回顾与梳理。

新主流电影这一概念的提出已二十余年,主要特征是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人生,旨在激发观众的家国情怀、民族自豪感,实现文化自信。新主流电影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三足鼎立局面,通过具体实践中的艺术进化与文化融合,成为一种相对成熟且广受关注的电影新形态,在美学追求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属性。

近年来,我国新主流大片抛弃以往概念化、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模式,采用多样化的创作类型、泛情化的处理方式,多从人性角度出发展示人物对命运的抗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纠葛,并深入到人物内心世界,塑造出更为真实立体、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在制作上,善于运用新科技手段,将主流价值思想、商业创作元素和艺术审美特质完美兼容在一部电影作品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市场回报。新主流电影的成功,取决于对时代趋势的把握和对受众观影习惯变变的认同。

以小见大,展现中国精神。随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越来越强。电影观众对新主流电影的接受已经走出一般的电影娱乐与电影观赏层面,并在时代精神、民族自信、国家伟业、英雄崇拜及为国自豪的理性与价值建构层面探索出一条新路。

2019年后,新主流电影逐渐摆脱宏大叙事,从小处入手,关注平民生活聚焦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又能小中见大,突显时代精神。如“我和我的”系列及“中国”系列均着力刻画能够体现各行各业中国人的精神风貌:飞行员、登山队员、缉毒警察、排球运动员、消防员等等,通过讲述不同行业人物的“职业故事”完成新主流电影的基本叙事架构。

艺 谭



为了更好地研究某一问题,我们往往需要从产生该问题的世界中超脱出来。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各式各样的“元问题”和“元研究”产生。所谓“元”是英文meta的中译,意思是“在……之上”“在……之后”“超越”“后设”等,而所有的“元问题”和“元研究”都涉及阐释、分析和反思,涉及自我指称或自我分析,因此,“元图像”即“关于图像的图像”,如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所画的《宫娥》;“元电影”即“关于电影的电影”,如意大利导演费里尼执导的电影《八部半》;“元小说”即“关于小说的小说”,如法国作家纪德创作的小说《伪币制造者》,等等。近来,由于互联网关注、资本加持而疯狂走红和流行的“元宇宙”概念和“元宇宙”现象,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要理解“元宇宙”,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宇宙”。所谓宇宙,其实是我们生存其中的现实世界的总称,是一个具有独特物质(暗物质)构造和独立时空结构的世界,正如《淮南子》所云:“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关于宇宙的起源和未来走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尽管科学家们很早就开始了探索,但至今尚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宇宙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研究者本身也生存于宇宙之中,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就像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逃离地球一样。因此,要考察宇宙和“元宇宙”问题,我们还得从现实宇宙中超越出来,真正从“元”的角度,即从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空的角度去观察,才能得其精髓和要义。

当然,所谓的“元宇宙”并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物质性宇宙,而是一种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智能耳机、VR眼镜、脑机接口等现代设备,而达成的虚拟仿真效果,即我们的意识被传递到一个虚拟世界,在这个超越现实世界的虚拟宇宙中,我们可以选定自己的形象,以区别于现实中的其他身份生活于其中,体验很多在现实世界不可能发生的精彩故事,获得很多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获得的异样体验……正如有人所认为的:“元宇宙”其实就是沉浸式”的“剧本杀”。

有关“元宇宙”的原始定义,一般认为是由美国小说家尼尔·斯蒂芬森在其出版于1992年的科幻小说《雪崩》中首先提出的。《雪崩》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不久的将来,那时的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车水马龙与颓废荒凉并存、尖端科技与低俗野蛮混杂的地方,美国政府则已经公司化,且沦为二流企业,为大财团大公司服务;然而,在这片喧嚣混乱的土地之上,还存在另一个无比广阔、极其自由的国度:一个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小说主人公希罗(Hiro)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名披萨送货员,同时也是一名天生的黑客和武士。当致命的雪崩病毒蔓延并威胁到虚拟现实本身时,希罗就成了制服病毒、拯救世界的人,小说叙述的是希罗穿行于两个平行世界的故事……正是在《雪崩》中,尼尔·斯蒂芬森提出了“元宇宙”概念来指代与现实世界同时并存的平行世界。

新主流电影引领观影潮流

□马天博



抚今追昔,在展现新时代精神的同时,观众也愿意对百年来中华民族前赴后继的无名英雄加强代入式了解。回顾艰辛过往,我们通过对历史的追寻以加强族群认同感,提升民族自信心。新主流电影通过营造能够令人感同身受、产生共鸣的场景激发观众的共情心理。《长津湖》一脱以往宣教式影片的窠臼,在描述宏大主题的同时,“以小见大”,展现个体命运,加强了人性人情内容的具体呈现。如有勇有谋、有人情味的七连连长伍千里,不谙世事、恐惧怯敌的新兵蛋子最终成长为不畏强敌、奋勇争先的伍万里,文质彬彬的七连指导员梅生,生龙活虎、作战勇猛的七连一排长余从戎,风趣幽默、智勇双全、被战

小说《雪崩》出版之后不久,由沃卓斯基兄弟导演的电影《黑客帝国》于1999年震撼上演,更是把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的平行世界的故事叙述得曲折离奇、精彩异常。由于电影《黑客帝国》大获成功,华纳兄弟公司又于2013年适时推出《黑客帝国》第二部《重装上阵》与第三部《矩阵革命》,从而把这个有关现实世界与网络“矩阵”关系的平行故事演绎得全球皆知。事实上,按照尼尔·斯蒂芬森的定义,《黑客帝国》系列片所讲述的正是有关“元宇宙”的故事。

如何才能在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中拥有和现实世界一样、甚至超越现实世界的经验和体验呢?我们的回答是:通过叙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没有经历或体验叙事,哪怕是进入到了虚拟世界之中,也不会有生动难忘的人生体验。事实上,正是通过叙事,是通过感受那些或喜或悲、或成功或失败,或浪漫或平庸的故事,让进入到虚拟世界中的人增加了经验、丰富了人生,从而拥有了在现实生活世界中不可能拥有的人生经历。那么,要叙述一个“元宇宙”或类似“元宇宙”的故事,需要运用一种什么样的叙事方式呢?或许可以从元叙事中找到答案。所谓元叙事,即在叙事中既出现一级叙事话语,也出现对一级叙事话语进行反思或说明的二级叙事话语,也就是说,这类叙事作品往往是叙述中包含叙述,故事之中还有故事。像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和电影《盗梦空间》,都是典型的元叙事,因为它们都是故事中包含故事的叙事作品,它们让阅读者看到“现实”是如何影响或创造“艺术”,而“艺术”又是如何自“现实”中产生并创造新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元宇宙”应该是一个既包涵现实世界又包涵虚拟世界的综合世界。如果有谁要创作一部有关“元宇宙”的叙事作品,那么就应该把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映射、相互依赖的事实作品中同时表现出来。

当然,现在人们热衷谈论的“元宇宙”,其实指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通过网络及相关设备进入到虚拟世界中所体验到那个平行世界。他们在这个虚拟的平行世界中的体验具有一种“超真实”,这种体验会强烈到让他们忘记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但我想,无论如何,除了人们身陷其中的虚拟世界,“元宇宙”还应该或隐或显地包括现实世界本身,也就是说,“元宇宙”应该是一种真实与虚幻交互共存的混合世界,否则,平行世界就失去了比较而最终会失去存在的价值。正如翁贝托·艾柯所说:“为了达到即使是最不可能存在的世界所感动、困惑、惊吓或触动的目的,我们得倚赖在现实世界所获得的知识,换句话说,就是以现实世界为基本。”就此而言,虚拟的平行世界其实应该是现实世界的寄生者。

在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及VR眼镜、脑机接口等设备“脱离”现实世界而进入到超真实的“元宇宙”,但与其说“元宇宙”是一个全新的创造,不如说这仅仅是因技术发展而带来不少新变化,完成了对一个老现象的重新命名。事实上,在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中,早就存在不少这类表现虚实共生的“元宇宙”叙事作品,仅就我国唐传奇中以梦为题的作品而言,就有沈既济的《枕中记》、白行简的《三梦记》、沈亚之的《异梦录》与《秦梦记》等,其中不少此类作品都通过典型的元叙事手法,写出了现实人生与梦中故事的虚实相生和相互映衬,如《枕中记》所写的就是黄粱美梦故事:主人公卢生在等待黄粱米饭蒸熟之际,做了一个美梦,在梦中他经历了洞房花烛、位极人臣、功名远播、儿孙满堂的成功人生,而醒来之后却“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卢生不禁大失所望……与电影《盗梦空间》相比,除了因时代发展而带来的技术手段,我们认为就故事本身和叙事技巧而言,《枕中记》所写的黄粱美梦故事都毫不逊色。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当人们沉浸于可能比真实还要真实的虚拟体验时,千万不要忘记了苦乐参半的现实生活,因为只有坚实而丰富的现实,才是生长一切虚拟美梦的真实土壤,这也应是“元宇宙”的题中应有之义。



士们戏喊为“雷公”“雷爹”的七连炮排长雷睢生等等,他们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富有生活情趣和人性本真。《悬崖之上》里,中共特工张宪臣本可以逃脱敌人的抓捕,却因为在车窗外见到疑似自己失散多年的亲生骨肉而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下车询问,结果被敌人抓捕。按照以往此类影片的情节设置,他必然不会感情用事,但是在新主流电影中,他难舍“小家”,更不会忘记“大家”,反而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在《我和我的祖国》中,无论是争分夺秒攻坚克难确保开国大典升旗仪式“万无一失”的设计师林治远,还是牺牲自己顾全大局、与恋人相逢不敢相认的科学家高远,抑或是在香港回归时与英国人

专家观摩研讨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

11月24日,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北京精彩时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我们是第一书记》专家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影片主创与来自学界、电影界和新闻界的各位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影片以“第一书记”为引,是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的第一书记们的“情感记事簿”,是脱贫攻坚战场上的精神丰碑。该片将于12月3日全国上映。

创新艺术手法,承载时代记忆。该片出品人兼制片人张苗分享了创作初衷。他用“时代的良知”来形容第一书记这一群体,作为一个电影人,他觉得自己有职责和义务,把这个时代最真实、最质朴、最打动人心的好故事留下来,用电影与新闻相融合的方式,将这些真实与感动的时代影像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新闻电影是一个新的拓展,这种拓展对于当下中国电影来说非常重要。影片从本体上来说,由一个个人感人的故事串联而成,在有限的空间里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从制作上来说,影片从3000多小时的素材中精心挑选而出,诚意十足。《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认为,影片通过对原生态村庄、边疆村寨的空间人文的呈现,有层次的人物塑造,克制的抒情性和现实生活的整体呈现凸显了真实感,保证了故事的整体性,实现了纪录片的艺术良知。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认为,电影摒弃了情景再现、画外音等纪录片的常见手法,采用融入式的创作模式,是新闻纪实电影的一次创新性尝试。

《瞬间中国》以青年视角触摸大国脉动

青年兴,则国家兴。如何与青年人共情,更好贴近青年、激发青年血脉中流淌的正能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打造的融媒体创新节目《瞬间中国》(第四季)以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总超过12亿,全网33次登录热搜榜的“破圈”传播圆满收官。节目以“百年青春青”为主题,每期三分种,从青春视角出发,讲述青年人的奋斗故事,展现了他们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以初心追逐梦想,以使命致敬百年,以奋斗寄语未来的青春风貌。

第二届IM两岸青年影展在平潭举行

11月18日到20日,由海峡卫视发起创办,福建省电影局、福建省广播电视台、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IM两岸青年影展在平潭举行。影展以扶持两岸高校青年影像创作力量为目标,集短片论坛、展映、大师班、训练营、表彰大会于一体。王小帅、胡智锋(线上)、陈玲珍(中国台湾)、徐小明(中国台湾)、咏梅、祖峰、唐大年、史航等业界嘉宾共同出席了本届IM两岸青年影展红毯及扶持表彰大会,见证全球华人高校学生的光影启航之路。

相较于第一届IM两岸青年影展,本届规模更大、影响更广,共有来自全球290所高校的学子参与其中。最终,北京电影学院《手风琴》从主竞赛单元的1376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麒麟最佳影片;美国电影学院《黄真真的演讲》获麒麟评委会大奖;台湾艺术大学高士文获麒麟最佳导演;台

谈判16轮分秒不让的外交官安文彬,都被置于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感情框架中。

手法多元,追求审美意象。“我和我的”系列,选择采用分段式结构表现时代主题,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观看长片的倦怠感。

如何将不同段落进行整合,很考验创作者的功力。《我和我的祖国》在每个片段前,还设置了过渡片段。七只看不出具体身份的手拿着富有时代感的纸笔,以记录日记的形式写出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场景。镜头只聚焦手中的笔和书写的痕迹,避免其他信息的泄露,设置悬念的同时,也有帮助观众适应接下来展开的情节,让七个部分在影像风格上趋于一致。《我和我的家乡》每段故事中间也有类似的转场设计,体现了创作者的巧思。同属一系列的《我和我的父辈》,以代际为章,讲述了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以及未来世界四个不同时代背景的故事,影片聚焦个体与家庭的关系,从家庭伦理出发,勾画时代精神谱系,呼应“家国情怀”这一主题。

《革命者》在表现手法上的突破是近年来新主流影片中较为突出的。影片以李大钊就义前38小时为基本设定,对李大钊革命生涯中几个重要时刻进行闪回串联。这种叙事结构目的并不在于对李大钊的生平进行描述,而是要以情为统领,让观众产生心理冲击,激发起观众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它容易让人想起流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意识流化、内心化影片,又并不完全一致。苏联作家伊利亚·艾伦堡认为,叙述性影片受制于逻辑,但另一种电影却不受限制,这种电影“能以其自由任性的形象,以非逻辑和联想,以一种‘气氛’来代替合理的发展而类似抒情诗”。在电影《革命者》中,最具表现力的是齿轮这一意象。陈独秀拿起李大钊赠还的表,一段CG镜头迅速插入,画面呈现的是瑞士表内部的齿轮啮合传动系统,随着虚拟镜头的运动,齿轮上浮现字幕,表明各地共举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

年轻语态,争夺注意力。得“注意力”者得天下。如何能让观众安静地坐下来欣赏一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并持续付出“注意力”,是创作者必须考虑的内容。纵观新主流影片的创作历程,坚持“小切口、大情怀”,讲故事不说教,已成为抓住年轻人注意力并实现成功破圈的一种有效路径。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在主旋律电影向新主流大片的迈进过程中,“技术”成为绕不开的关键词。一方面我们需要技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为技术所累,而要 let 创作回归与观众共情共鸣的初心。

此外,新主流电影有义务主动承担起思考中国电影美学发展趋势、探索民族电影美学构建路径的重要职责,以契合当代观众对爱国主义、民族情怀、中国梦的心理需求。新主流电影需要用更大的创作智慧、更睿智的生活发现、更自觉的人文追求,来展现中华儿女追求真理、追求美好生活、追求道德理想的伟大进程。

讲好中国故事,真实震撼人心。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协会会长梁刚建认为,这部电影用鲜活而非说教的态度,用一个个鲜活例子、鲜活的形象、鲜活的故事告诉了观众,脱贫攻坚到底是什么、又是怎样做的,以及对子孙后代会有怎样的影响。《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表示,影片用真实的影像和人物表达了质朴的情感,能够让观众产生深刻共情。影片还通过心理与情感的刻画,告诉观众第一书记并不是万能的,让人感受到真实的力量。“第一书记”将成为历史中一个专有名词被代代流传,这部电影注定是一部能够留得下的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祝晓凤表示,影片展示了第一书记们扶贫的艰辛以及村庄脱贫前后的鲜明变化。透过电影,我们看到成千上万个第一书记深入基层,这背后党组织的坚强力量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向上精神感动着每一位观众。

顺应时代号角,用心提升作品品质。脱贫攻坚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认为,影片对历史事实、家国情怀、生命价值等进行影像书写,为脱贫攻坚这段伟大历史留下生动的艺术切片,具有人类学和社会学文本的价值。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丕民在最后总结中指出,该片是一部“值得留下来”的作品。影片不论是题材选择、人物塑造、镜头运用、色调转换还是音乐铺陈,都显现出整个创作团队的用心用心。(小宇)

